

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

王永生 主編

下

责任编辑 夏文琦

封面设计 邹刚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下）**

王永生 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375印张 330千字

印数 1—1,000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7-221-01595-3/I·216 定价：6.00元

## 内 容 提 要

这是我国第一部反映五四运动至建国以前这一时期文学理论批评发展情况，总结其经验教训的学术著作。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重点项目研究成果之一。它改变了中国文学批评史领域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后文学理论批评获得迅猛发展的情况略而不论的局面，填补了学术研究的一段重要空白。它对文艺工作者更好地吸取历史教训，为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更好地开展文学评论，也具有重要意义。编写者们充分掌握第一手资料，见解新颖，立论公允，要言不烦，文字浅显，适合广大文艺爱好者、理论工作者与高等学校文科师生阅读。全书共分上、中、下册出版。

## 下册各部分执笔分工

第一章、第九章	许道明执笔
第二章、第三章	张新执笔
第四章、第六章	沙似鹏执笔
第五章、第十章	贾鸿猷执笔
第七章、第八章	王永生执笔

# 目 次

第三编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第三个十年 (1937—1949) .....	(1)
<b>第一章 抗战前期的文学思想论争</b> .....	(3)
第一节 在民族解放旗帜下的文艺运动与思想论争 .....	(4)
第二节 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 .....	(18)
第三节 延安文艺整风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	(35)
<b>第二章 本时期的诗歌理论批评</b> .....	(50)
第一节 艾青和他的《诗论》 .....	(51)
第二节 对传统诗学的反思 .....	(66)
第三节 朱自清与现代诗歌批评的历史研究 .....	(79)
第四节 九叶诗派和诗歌的现代主义 .....	(92)
<b>第三章 本时期的小说理论批评</b> .....	(105)
第一节 小说的贴近群众与小说形式的中国化探索 .....	(106)
第二节 七月流派和路翎小说引起的理论思考 .....	(120)
<b>第四章 本时期的散文理论批评</b> .....	(134)
第一节 报告文学理论的新发展 .....	(135)

第二节	学习和继承鲁迅战斗传统的杂文理论·····	(149)
第三节	叙事抒情散文创作艺术的理论探讨·····	(163)
<b>第五章</b>	<b>本时期的戏剧文学批评·····</b>	<b>(171)</b>
第一节	郭沫若等人的历史剧理论·····	(172)
第二节	围绕讽刺喜剧问题展开的讨论·····	(183)
第三节	《逼上梁山》上演前后关于旧剧改革 问题的探讨·····	(190)
第四节	《白毛女》为代表的民族新歌剧建立过 程中的理论探讨·····	(197)
<b>第六章</b>	<b>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b>	<b>(202)</b>
第一节	现实主义问题讨论简况·····	(202)
第二节	何其芳的《关于现实主义》及其关于 “客观主义”的通信·····	(215)
第三节	《大众文艺丛刊》对“主观论”的 批评·····	(225)
第四节	胡风关于“主观”的理论及其 《论现实主义的路》·····	(235)
<b>第七章</b>	<b>本时期其他文艺论争与文艺思想斗争·····</b>	<b>(245)</b>
第一节	对文化专制主义文艺政策的抵制和 批判·····	(245)
第二节	对汉奸文艺的批判和对投敌文人的 批评·····	(251)
第三节	对“纯正艺术”论与文学上的“中间 路线”的批评·····	(261)
第四节	关于小说《虾球传》的讨论·····	(269)
第五节	关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 讨论·····	(277)
<b>第八章</b>	<b>本时期一些领域的文学理论建设·····</b>	<b>(289)</b>

第一节	新文学运动的历史回顾与经验总结·····	(289)
第二节	文学基础理论读物的新成果与文学批评自身的理论建设·····	(309)
第三节	儿童文学与传记文学领域在本时期的理论建设·····	(327)
<b>第九章</b>	<b>本时期的作家作品评论·····</b>	<b>(354)</b>
第一节	“抗战与民主”的批评时代·····	(355)
第二节	黑暗和光明交战中的文学评论·····	(372)
第三节	政治对文艺批评的重塑·····	(390)
<b>第十章</b>	<b>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对于新文学运动的理论总结·····</b>	<b>(401)</b>
第一节	第一次文代会的基本精神·····	(402)
第二节	文代会对新文学运动的理论总结·····	(405)
第三节	第一次文代会精神与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衔接·····	(416)

# 第 三 编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  
批评发展的第三个十年

(1937——1949)



## 第一章 抗战前期的文学思想论争

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民族生死存亡的生活和情绪以空前深刻的力量规范了整个文学发展的过程，提出了许多迫切正当的要求。文学理论批评也被这种基本氛围所笼罩，显示出相应的色彩：生气勃勃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成为压倒一切的意识、原则、标准，甚至是惟一的选择。

发生在抗战前期的几次文学思想论争，其中有对文艺运动性质的论述，有对抗战头几年文学发展趋向的估计，以及关于怎样理解抗战文艺的特征等等，所有这些，以逼视抗战现实前途起始，而以高扬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为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背景，使这些论争似乎不主要在抗日与不抗日等问题上发生分歧，而集中在民主精神和文学本体性两个方面的冲突。围绕民族意识这个主题，积极阐发民族意识中的人民精神和将民族意识归结为统治者中心意识的体现，构成了这一阶段文学思想上坚持民主和推行专制的斗争。此外，围绕民族意识这个主题，张扬民族意识中的阶级观点和将民族意识抽象化，这是本阶段文学思想论争另一侧面的两股张力，主要从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上展示着矛盾冲突。

广大作家在这一阶段生活方式和创作方式的改变，特别是对文学任务和文学对象的重新认识，促使他们对“五四”以来现代

文学的表现形式作了认真的反思，试图提出既符合当前文学需要又能烛照未来文学发展的新设想。互不统一的看法以民族形式及其当代性为焦点，进一步暴露了前一时期已萌芽的对现代文学历史的基本估价上的分歧。论争的收获虽并不十分显著，但提出的课题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是本阶段文艺领域最重要的事件。它从根本上端正了抗战文艺运动的方向，它植根于对现实的深刻把握和对现代文学历史的精到的总结，从而也成为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辉煌的收获，辟划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它的许多根本性的指导意见，不仅凝集着本阶段文学批评中最高民族意识和民主精神，同时还继往开来，成为现代中国革命和进步文艺发展的灯塔，照示了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新阶段的到来，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宝库。

## 第一节 在民族解放旗帜下的 文艺运动与思想论争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同年8月13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又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对日作战。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慑于国际国内政治情势的压力，改变了政策重点，被迫正式宣布抗战。

抗日战争一经开始，使整个社会生活和文艺运动的条件都发生极大变化。民族矛盾的急剧上升，抗战成为全国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统率一切的主题。进步的文学阵线也以抗战作为自己的旗帜，继承着上一时期的战斗传统，扩大、深化和发展了“9.18”东北事变以来全国抗日救亡文学运动，反侵略、

反独裁、反投降、反分裂，成为它的主潮，因而全面抗战爆发后的文艺运动渐次呈现出系列全新的面貌。

新的现实促进了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1938年3月27日在武汉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一次最广泛的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组织，其会员包罗了全国各抗日阶层的作家，反映了抗战时期新的政治要求和阶级关系的变化。这是抗战以来中国文艺界最值得纪念的事件，不仅对促成团结和领导全国文艺作家服务抗战工作有巨大的实际贡献，并且也使各派作家在彼此接触的过程中，加强了互相了解和影响，推动了文学运动的发展。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一切进步的和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作家在统一战线内部虽也存在着某些思想分歧，甚至这种分歧从未间断，但一般都在互相影响与批评中更进一步发挥先进的作用与积极的力量。

抗日战争中存在着两种相对立的政治路线：一条是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全国人民的团结一致积极抗战的路线，另一条是以国民党反动派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投降路线。两种不同政治路线直接造成两种完全不同的地区：一是由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抗日民主的“解放区”，一是为国民党反动派集团所控制的“国统区”。事实表明两种不同的政治环境形成了文艺运动的两种不同的战斗任务和工作方式。民主自由的政治氛围使解放区的文艺运动从一开始就继承了老苏区文艺的革命传统，和广大人民，特别是和其中的农民与兵士有了初步结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解放区的文艺运动，更有空前巨大的发展。而“国统区”的文艺运动虽然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并且其总的目的同解放区也基本一致，但随着政治逆流的不断抬头，不时也出现一些曲折的形势。广大作家为了人民的民主自由与抗战胜利前途，从事着艰苦卓绝的斗争，软弱的具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倾向的作家大多虽还守持

着民族的立场，面对蒋介石统治集团箝制民主自由的法西斯统治则不时表现出迷惘和消极的态度。国统区进步作家和自由主义倾向的作家发生过的多次文艺思想论争，其主要根源也在这里。

战事的扩大，沿海大城市特别是文化中心上海的失守，广大作家一度失却了原先的创作条件，战争使他们从书斋和亭子间解放出来，摆脱了过去比较狭窄的生活圈子。绝大多数作家，从多种角度以各种方式接近和参加了人民的战斗生活，用当时流行的一句话说，就是“突进了现实生活的密林”。全国亢奋的抗战激情，倥偬转辗的生活格局使作家们无法潜心于构筑鸿篇巨制，无法浸润在精巧缜密的构思中，文艺为宣传抗战，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团结和启蒙抗日力量成为当时绝大多数文艺工作者的最高使命。由此，大量鼓吹抗战的通俗读物和小型作品得以蓬勃发展，随着文协“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口号的发起和深入，前一时期已有发展的文学大众化的趋向也得到现实的强大推动。这是抗战文艺兴起后的一个重要特点。茅盾后来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的报告中曾说：“当抗日战争初起，全国文艺工作者都非常兴奋，立即组织了许多演剧队、抗宣队，到农村和部队中去，写出了许多短篇和小型的作品，如短篇小说、报告、活报、街头剧、报告剧、墙头诗、街头诗等。尽管这些作品还存在着严重的缺点，但没有人能够抹煞它们在抗战初期所起的宣传作用。”

抗战前期的文学理论批评适应抗战文艺运动的新特点，最初集中在对抗战通俗小型作品的估价，以及抗战文艺的任务方面，反应很不一致。有一种观点将大量出现的抗战文艺作品作为“差不多”，“抗战八股”和“公式主义”，把作家从事抗日文艺活动，深入前线，叫做“前线主义”，等等。其中以梁实秋的文学“与抗战无关”论，沈从文的“反对作家从政”论和施蛰存的“文学贫困”论为较突出的论点。

1938年12月1日，梁实秋在重庆《中央日报》由他主编的《平

明》副刊上发表《编者的话》，在反对“公式主义”的前提下，把抗战作品中的大多数判罪为：或“只知依俯于某一种风气而摭拾一些名词敷衍成篇的‘抗战八股’”，或是“不负责任的攻击别人的说几句自以为俏皮的杂感文”。并且还公开征求与抗战无关的文章，声称“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与抗战有关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谁都没有好处的。”梁实秋的这类主张，在风起云涌的抗战年代，当然不会有很大的市场，重庆、上海、香港等地的作家群起撰文表示了异议。舆论焦点大致主要指出梁实秋的文学“与抗战无关”论，实质上削弱了文学服务抗战的任务，客观上使作家脱离抗战的现实，从而危害文艺运动的健康发展。关于梁实秋，在本书第一编中曾经介绍过他关于人性的主张及其在当时文坛所引起的反响。梁实秋（1902—1988），原籍浙江，出生于北京，“五四”时期属于“新月社”的重要理论家。曾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重庆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校教授。一九四九年到台湾后，任台湾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并创立台湾英语教学中心和英语研究所。代表著作有散文集《雅舍小品》、《英国文学史》，评论集《浪漫的与古典的》以及译著《莎士比亚全集》等。梁实秋上述“与抗战无关”论主张，相当一批进步的 and 革命的作家、文艺理论批评家几乎共同认为，抗战的现实是一种最高最本质的规定，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无法摆脱这一规定，一个忠实的作家，要想找寻“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实际上是在削弱自己神圣的责任。当时罗荪的意见很有广泛的概括面和代表性。罗荪（1912— ）原名孔罗荪，山东济南人。三十年代中期正式步上文坛，主要从事文学理论批评活动。抗战开始后，和冯乃超、蒋锡金等创办宣传抗战的综合性杂志《战斗》旬刊，“文协”成立后担任机关刊物《抗战文艺》的编委，是抗战时期活跃的文学批评

家。他在重庆《大公报》副刊《战线》上发表了批评梁实秋的文章，认为：“抗战已经进行了一年又六个月的今天，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要为祖国的抗战服务……作为时代号角，反映现实的文学艺术，更其不能例外的要为祖国的抗战服务。”<sup>①</sup>至于创作中公式化倾向的产生，有人指出，并非因为写了与抗战有关的题材，而正是由于作家“与抗战有关的程度还不够深”<sup>②</sup>，克服这种倾向，恰恰需要作家更好地深入抗日的现实斗争。郭沫若对此认为，只要在为抗战服务这一总的主题之下，不仅要写现代题材，也要写古代题材，不仅要写中国题材，也要写外国的题材，能否使作品真正为抗战服务，主要是决定于作家是否具有为抗战服务的正确思想<sup>③</sup>。

继文学“与抗战无关”论，沈从文在一年后，连续发表了《一般与特殊》、《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文学运动的重造》等文，把他心目中“一般”的抗日作品，称为“抗战八股”、“宣传文字”和“一团糟”，进而提倡应该着重“特殊性的专门家”的工作，唯其如此，才是“社会真正的进步”。<sup>④</sup>他还认为，“作家被政治看中，作品成为政策工具后”，文学就会出现“堕落倾向”，作家则变成“趋时讨巧”<sup>⑤</sup>的工具。因此，他反对作家与抗战现实生活发生密切的联系，认为作家努力参加抗战宣传动员工作是一种不体面的“从政”，提出“反对作家从政”的说法，呼吁要发动“文学运动的重造”，“使文学作品的价值，从普通宣传品而变为民族百年立国经典。”<sup>⑥</sup>这些论点也同样遭到了文艺界的批判。许多文章大都从总结概括抗战以来作家的进步和文艺的

---

① 《再论“与抗战无关”》，重庆《大公报》《战线》1938年12月9日。

② 宋之的，《论抗战八股》，《抗战文艺》第3卷第2期。

③ 见《抗战以来的文艺思潮》，《沸羹集》。

④ 《一般与特殊》，《今日评论》第1卷第4期。

⑤ 《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战国策》第3期。

⑥ 《文学运动的重造》，《文艺先锋》第1卷第3期。

社会作用，着力阐发这是关系整个民族存亡的关键时代的伟大事业，作家所以用他们的笔乃至整个生命呈献给抗战，带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创造着壮怀激烈的抗战文学，原因在抗战的命运决定着文学的命运。罗荪严正指出：沈从文的主张是“以‘特殊’抹煞‘一般’”，这种意见的危害是“远超过了‘无关抗战’的论旨。与其说他是有意地脱离了一般化的工作基础，建立特殊的专门工作，不如说是企图抹杀一般化的文化工作，企图停止今日的启蒙的，有着群众性的教育意义的一般文化工作，”是一种“混乱了视线”的错误主张<sup>①</sup>。郭沫若在题为《新文艺的使命》一文中以历史为证，指出：“假使是在军阀统治时代，一个作家要以蝇营狗苟的态度，运动做官，运动当议员，那当然是值得反对的事。……然而在抗战期间，作家以他的文笔活动来动员大众，努力实际工作，而竟目之为‘从政’，不惜鸣鼓而攻，这倒不是一种曲解，简直是一种诬蔑！”

虽然同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然而具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倾向的作家对抗战初期的文学实绩一般都采取轻视的态度。1942年，施蛰存在《文学之贫困》<sup>②</sup>一文里就发出了文学贫困的议论，全面否定抗战几年来的文学收获。他首先把大批忠诚服务于抗战的作家一概看成“仅仅是个架空的文学家，生活浪漫，意气飞扬，语言乏味，面目可憎，全不像一个有优越修养的样子。”然后，他又轻率而粗暴地认为：“抗战以来，我们到底有了多少纯文学作品？你也许会说：我们至少有不少诗歌和剧本。……但是如果我们把田间先生式的诗歌和文明戏式的话剧算作是抗战文学的收获，纵然数量不少，也还是贫困得可怜。”施蛰存的这种估计，引起文艺界普遍的义愤。陈白尘（1908—— ），原名陈增鸿，江苏淮阴人，现代戏剧电影艺术家，特别擅长讽刺喜剧。他在

<sup>①</sup> 《抗战文艺运动鸟瞰》，《文学月报》第1卷第1期。

<sup>②</sup> 《文艺先锋》第1卷第3期。

《读书随笔——文学的衰亡》<sup>①</sup>一文里发挥了他特有的讽刺才能，批判了“文学贫困”论的虚妄实质。文章指出：发出这类议论的人大凡是“隐士式”的文学家，是“不与世俗同流，不大爱吃人间烟火食的。尤其是，那干戈扰攘之秋的乱世，隐士们便急流勇退，回到山林去了。等到天下太平，再回人世间来感喟一番。”接着又说：“隐士们天真而性急了一点，刚刚隐居了三年五载，伸出头来便向人要伟大作品，似乎还过早一点。”许多批评文章对抗战文艺实绩抱着乐观的态度，陈述事实，概论收获，用以批判“文学贫困”论。以群指出：“抗战以来在武汉、重庆、延安等地区，不仅产生了不少优秀的诗歌和剧本，而且还有不少优秀的长篇和短篇小说。它们底收获，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为丰富。”<sup>②</sup>抗战文艺的成绩毕竟是基本的，并且特殊时代决定了文学的特殊面貌，采取贵族化的立场，轻浮地指责和扩大其可能存在的问题便很不足取。郭沫若驳斥得好，他说“文学贫困”论者“有一点是说得最为准确，便是说到了他自己的‘贫困’。战前的那批苍白色的风流不凡，孤芳自赏的文士，自抗战发生后差不多连一字都没有写出。田间尚有诗，剧作家尚有‘文明戏’，而这种说教的人却只有‘文学的贫困’而已。”<sup>③</sup>

抗战前期，梁实秋诸人的错误文学主张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在文学领域的反映。它们作为一种思潮在整个抗战文学运动中从未消失过，不时还会改头换面浮现出来，相互呼应，相互补充。除文学“与抗战无关”论，“反对作家从政”论，“文学贫困”论外，还有不少繁多的名目。例如，朱光潜即使在洪涛澎湃的抗日背景下依然宣扬着“冷静超脱”的文学态度，推崇所谓“静穆和平”的美学理想。侍桁更有坦白的表示，他说，“因为对于时代

① 《文艺先锋》第1卷第6期。

② 《“拿货色来看”和“文学贫困论”》，《在文艺思想战线上》。

③ 《新文艺的使命》，《沸羹集》。